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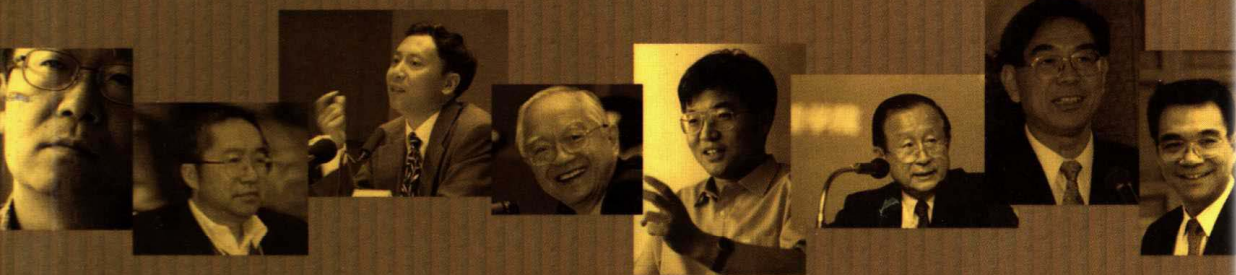
顾问 林毅夫
周志忍

中国论衡文库

和谐增长

中国经济的未来

张占斌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顾问 林毅夫
周志忍

中国论衡文库

和谐增长

中国经济的未来

张占斌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张占斌主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
ISBN 7-80706-222-3

I. 和... II. 张... III. 国民经济计划-五年
计划-中国-2006—2010-文集 IV. F123.3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369 号

特约编辑: 丁又双
装帧设计: 张晶灵
版式设计: 李如琬

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

主编: 张占斌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99 千字

印张: 11.5 插页 1

印数: 1—5100

ISBN 7—80706—222—3/F · 253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594779)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555 分机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勇敢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累累弊端,创造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容,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持续稳定相伴的“中国奇迹”。东方大国和谐、和平发展并走向崛起的神采魅力,激发了国人的发展潜能和责任意识,也使国际社会的目光为之聚焦。

中共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描绘了未来的大国风貌,谋求效率与公平协调统一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创新也已陆续展开。一个将来可以证实的现象是:中国大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大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需要更民主的智慧和更科学的选择。面对战略机遇期,需要知道我们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要什么,需要知道我们如何做。这些都需要知识群体和普通民众话语的有效通融,并能够与国家决策达成共识和默契。

大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思想沟通的精神家园,需要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略、专家学者的研究思考传递给关注国家发展的各界朋友。希望通过各界朋友的再思考来完善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以此来推动国家的大政方略更加缜密,更加符合国家的发展实际。《中国论衡》文库系沧海一粟,面对神圣事业,心向往之,定当树立责任意识,努力前行。

《中国论衡》文库编委会

2006年4月

目录

辑一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001
吴敬琏 1. 中国新型工业化研究	003
王梦奎 2.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体制保障	013
林毅夫 3. 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035
胡鞍钢 王亚华	
4. 中国大发展背后持续增强的多重驱动力(1980—2003)	043
张 军 5. 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	056
常修泽 6. 中国转型期发展服务业中的五组经济关系研究	066
辑二 和谐社会与统筹经济利益	077
高尚全 1. 社会再分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	079
陆学艺 2.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调整	085
黄宗良 3. 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	096
刘福垣 4. 社保制度的理智选择	104
蔡 昉 5.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选择	114
李培林 6. 重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122

辑三 新农村建设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127
陈锡文 1.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29
林毅夫 2. 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几点建议	138
韩 俊 3.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 任务	143
温铁军 4.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52
王一鸣 5. 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	155
 辑四 科技自主创新与创新性国家建设	 161
徐冠华 1. 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 对策	163
中国工程院课题组 2. 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研究	169
陈佳洱 3. 基础研究:自主创新的源头	204
吴敬琏 4.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215
张彦宁 5. 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41
 辑五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对外开放	 247
中国工程院课题组 1. 经济区划及其区域政策调整 研究	249
张维迎 2. 大中华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与 产业整合	273
刘世锦 3.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	282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 4. 如何构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新	

格局	290
余永定 5. 全球不平衡条件下的中国 经济政策	308
辑六 政府创新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317
陈福今 1.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 水平	319
唐铁汉 2.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思路 与对策	3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课题组 3. 构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	334
迟福林 4. “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七点建议	345
张占斌 5. 政府层级改革的酝酿：省直管县 与强县扩权	351
编后记	360

中国论衡

和谐增长：中
国经济的未来

辑一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无论公私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过度投资极易造成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如果投资决策普遍失误或者泡沫破灭,还会引起金融系统的风险。殷鉴不远,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吴敬琏

中国新型工业化研究

- 经济学对不同增长模式的分析
-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学对不同增长模式的分析

现代经济学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这四个发展阶段是:(1)“起飞”以前的阶段,即产业革命以前,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靠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2)19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用机器大工业代替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手工劳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是重工业,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来支撑的。按这种模式进行的工业化叫做“旧型工业化”。(3)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发展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把先行工业化国家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靠效率提高实现。这种增长模式体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4)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计算机、现代信息技术(IT),所以,先行工业化国家逐渐进入信息时代或者叫知识经济时代。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信息化带动。

1. 经济学对“旧型工业化道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所作的分析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进行,经济增长逐步摆脱了“起飞前”的状态,摆脱了土地约束,依靠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是靠狭义的工业化,即用大机器工业作业

去替代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手工劳动。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还要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这就要有钢铁等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作为基础。所以,旧型工业化道路,即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增长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依靠资本积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叫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现代经济学中叫做资本深化)。

马克思最早指出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端。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的现象:一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随着用于购买机器的不变资本(物质资本)比重的不断增加,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利润)的可变资本比重的不断降低,利润率必然会下降。利润率的不断降低导致竞争加剧,必然出现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垄断。另外一条规律叫“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的规律”,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工资总额的相对减少,所以就业岗位就会减少,或者使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从而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根据上述严密推论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列宁和斯大林与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列宁在1893年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导出另一个规律,即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最快,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次之,消费资料增长最慢。到了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在吸收“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和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第Ⅰ部类投资决定增长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路线”,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是自发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可以自觉地来做,不需要从轻工业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借助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可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在1929年被正式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

路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

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和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对西方经济学家具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并指出,越是到了高级阶段,资本品生产对消费品生产的比例愈高。他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作出预言: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后,资本品的生产将超过消费品的生产。由于当时还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在经济只有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总体框架下,重工业在工业中占优势也就意味着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所以,霍夫曼的这个预言被人们推演为工业化后期将是重工业化阶段,此时重化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并被称为“霍夫曼定理”。因为这个“定理”是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经验推演而来的,它也被称为“霍夫曼经验定理”。

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受到早期增长模式类似的影响。例如,流行多年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概括。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资本产出率是不变的,所以增长就决定于投资,投资越多增长越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的基本工作仍以该模型为理论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相信,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的秘诀是增加积累,增加投资。

2. 经济学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所作的分析

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情况表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失业率提高,以及霍夫曼关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的预言都没有实现:平均利润率没有因为资本深化而呈现下降趋势;失业率大体保持不变,而工人的工资水平随着人均产量的增加反而呈上升态势。同时,与霍夫曼所提出的理论相反,在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和占主要地位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工业中的重工业,而是服务业。为什么马克思和霍夫曼的预言没能实现呢?原因并不在

于马克思和霍夫曼在理论推导上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即增长主要不是靠物质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推动。

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大致有以下三个:

第一,“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技术进步靠的是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即“熟能生巧”。这种进步是改良性质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可能有革命性的改进。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涌现的某些技术虽然也是在与科学家交流中产生和应用热力学原理的结果,但大多数技术改进仍然是基于经验和由工匠进行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 19 世纪中期基本上完成了对科学发明和科技创新激励的制度化,从而大大地激发了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的创新热情,使得基于科学的技术大量涌现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层出不穷使生产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对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起了重要作用。20 世纪发展最快并对经济发展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并不是消费性服务业,而是为制造业、农业等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前端的教育、研发(R&D)、设计、采购,后端的营销、维修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等。

不管是就业人数还是产值,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也就是在进入所谓“工业化后期阶段”后,服务业在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都已成长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

20 世纪制造业的一个巨大变革,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体化。我们现在所讲的工业或制造业,其实是已经和服务业相融合的工业和制造业。比如索尼照相机,它主要的成本体现在研发、设计和分销、维修服务等方面。索尼作为制造业企业,它最赚钱的领域是什么?是影视业,而影视业的内容又是服务业提供的。所以,有人把先行工业化国家后期的工业化称为“服

务业—工业化”。

运用现代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理能充分认识服务业发展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意义。亚当·斯密早就指出,技术进步是以分工深化为依托的,但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分工各分支之间的交易会愈来愈频繁,因此用于交易的资源也会增加。而服务业正是处理交易活动的,所以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乃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服务业一方面能够减少生产环节的成本,但是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越来越高,服务业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就越来越突出;越是发达的分工,越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去完成交易,而发展服务业就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基本手段。

提高效率的第三个源泉是信息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现代信息技术(IT),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渗透到各行各业的信息成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新的有力武器。信息化在发达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情,但是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适宜的场合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来处理信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叫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的“新”,是相对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早期增长模式而言的。第二层含义的“新”,就是为工业化增加了新的加速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沿用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重工业。这条工业化路线造成了农业衰退、农村偏枯等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些问题,提出要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但由于这条工业化道路和缺乏效率的增长模式缺乏根本性的认识,因而在“大跃进”运动中反而把钢、煤等重工业的发展提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把一切能够动员的资源都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虽然“大跃进”的荒谬做法遭到人们的唾弃,但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以及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模式并没有被否定,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高投入和低效率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在1979年和1981年两次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九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实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也的确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着重于改变外延增长的结果,强调要依靠效率提高来实现增长,而没有着重于改变外延增长的原因,即改变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那种依靠资源和资本高投入的增长模式,找到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的办法,特别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些旧体制的遗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还保留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过大配置权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以市场为配置主体的,市场会把资源导向效益高的地方。但在目前,中国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各级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仍然掌握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二是GDP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主要的政绩考核标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服务,而并非是经济的主人。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政府是国民经济的主持者,各级政府官员也就成为经济发展状况的首要责任人。三是中国现行的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制度促使各级政府官员希望发展价高税大的产业。四是要素价格扭曲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了优先发展资源和资本密集、盈利性却很差的重化工业,采取

了对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无偿调拨或把价格尽量压低的政策。这种政策至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使经济核算发生扭曲,并促使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尽力发展那些社会效益很差但在价格扭曲的条件下表现为高盈利的重化工业。

如果说“九五”计划和前面的调整都是向着否定旧型的工业化道路迈出了步子,到了“十五”计划时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五”计划提出,要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主线。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提法。因为所谓经济结构是指资源配置结构,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正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内容。问题在于,由谁来进行调整和怎样进行调整。在前面讲的体制条件下和政策环境中,许多人都把调整结构看成一种政府行为,由各级政府官员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调整经济结构。按照中共十四大的决定,市场应当在调整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十五”计划期间,我们看到,许多地方要发展哪些产业,以哪些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以至重点扶持哪些企业等等,都是由当地主要领导来决定。在前面提到的现行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条件下,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实现经济重型化的方针,运用自己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力或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力,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种不顾资源禀赋的状况片面追求经济结构重型化的浪潮,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扬长避短地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正确配置资源的首要要求,是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扬长避短和发挥优势。中国的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和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然而在“重型化”导向下,许多地方却集中物力财力去发展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这就变成了扬短避长,必然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